



王詩琅選集第六卷

# 臺灣人物誌

王詩琅 著／張良澤 編

琅選集 第六卷

臺 灣 人 物 誌

王詩琅  
張良澤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人物誌／王詩琅著. 張良澤編. —初版—

台北市：海峽學術，2003〔民92〕

面； 公分（王詩琅選集；第6卷）

ISBN 957-2040-53-7（平裝）

1. 臺灣－傳記

782.632

92009027

# 歷史的漏洞

藍博洲

眾所周知，因為國共內戰、兩岸封斷的政治因素，在兩蔣時代反共國安戒嚴體制下，台灣的近現代史研究一直是充滿這樣那樣的禁忌的。到了廿世紀七〇年代中葉以後，隨著「鄉土文學論戰」在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以及黨外民主運動在政治上的左衝右撞，長期被湮滅的台灣近現代史與歷史人物，才在諸如《夏潮》雜誌等有識之士的推動下，陸續出土。

作為日據下「黑色青年」先驅之一的王詩琅的歷史及其作品，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出土的。

記得，第一次知道並閱讀王詩琅先生的作品，是在一九七九年剛上大學的那年冬天吧！因為打折的關係，在台北書店買到德馨室出版社出版的《王詩琅全集》一套十一卷，並且比較認真地讀了第九卷《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和第十卷《夜雨》。幾年後，通過《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一書，又讀到一些《全集》沒有收錄的相關文章，對詩琅先生的歷史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再後來，因為參與《警察沿革志——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版的編輯工作，有機會較完整地認識到詩琅先生作為無政府主義青年時的思

想與行動。

我想，詩琅先生的歷史面貌，至此，應該已經完整而清楚地呈現，沒有隱漏了吧！

吳濁流先生說：「歷史很多漏洞。」

事實的確如此。

濁流先生說：「光復後，很多人偽造歷史，……日政時代的御用紳士……一躍變爲愛國份子的也有；反之，有許多真正的志士都埋沒在地下，這是很不公平的。」

這裡，我並不是要說，詩琅先生也有「偽造歷史」的問題。我要說的是，因爲反共國安戒嚴體制的嚴酷限制，使得詩琅先生在有生之年終究沒能把他過去的歷史，向後人作完整的交代！我的意思是說：是特殊的、不健康的歷史條件，不讓詩琅先生交代那段不爲人知的歷史；不是他「偽造歷史」。

那麼，人們要問：「詩琅先生究竟還有什麼歷史沒有交代呢？」

我說，那就是他參加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也就是蔡孝乾領導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那段歷史！

我知道，人們，尤其是獨派那些靠搞台灣史升等或升官的學者們，一定會說我在虛構、僞造歷史。

「王詩琅怎麼會參加共產黨？證據拿來！」

我當然拿不出什麼物證來的！畢竟，當年的地下黨並沒有核發什麼黨證之類的東

西，即使有，歷經長期肅殺的白色恐怖風暴，有誰還會留下這個殺十個頭都不夠的「罪證」呢？

「那麼，你有什麼根據？」

我的根據是：一九四五年，曾經與詩娘先生在廣東花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共事的蕭道應醫師的歷史證言。

蕭道應（一九一六—二〇〇二），屏東佳冬人，一九四〇年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後，隨即與鍾浩東等客籍愛國青年，前往大陸，投身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為抗日戰爭貢獻一己之心力。抗戰勝利後，在前述集訓總隊任中校政訓主任，因而與該隊台籍政治教官王詩娘等熟識。

一九四六年六月，蕭道應比王詩娘晚一步回台，隨即由杜聰明推薦，任職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系。據安全局檔案所載，一九四七年冬，蕭道應由中共在台地下黨省委之一張志忠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接受張志忠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調查研究工作。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蕭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提到，當時任職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王詩娘，後來也通過他的介紹入黨，由他單線領導；即便省黨部秘書——丘念台的女婿——王致遠，也不知道他和王詩娘的組織關係。

其後，蕭道應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在三義山區被捕，不得已「自新」後留置調查局任法醫的工作。終其一生，未曾暴露他和王詩娘在地下黨的組織關係。同樣地，詩娘

先生也沒有客觀條件敘說這段「秘史」。另外，在地下黨單線聯繫原則下，除了蕭道應自己，知道這段王詩琅秘史的應該就只有張志忠了；可他已於一九五四年槍決犧牲了。因此，在所有相關人證都已故去，又沒有具體物證的情況下，人們有理由大聲說，這是「虛構」，乃至於「偽造」的歷史。

然而，我無意為此爭辯！只是想把採集到的某種歷史說法公諸於世，讓人們可以多一個面向，去認識過去的歷史人物與他們走過的時代，如此而已。

話說回來，如果人們認識到當年花地集訓總隊的教官與隊員們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包括張旺、鄧錫章、王石頭、高草、黃培奕、石聰金、賴阿煥……等等男女隊員和教官都投入地下黨的革命，並遭到槍決監禁或流亡的命運；那麼，我們對曾經是「黑色青年」的詩琅先生的這段「歷史的漏洞」，也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自序

人之一生好像長途旅行一樣，可是說也奇怪，每一個人走的路，倘若仔細觀察起來，卻都不相同，真的是千態萬樣的。能夠按照自己的理想，原定的計劃走完了漫長的歲月，實在是微乎其微。走的路不是被迫跟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便是隨波逐流，再不然本是沒有甚麼奢望，走的卻超出自己的理想，一帆風順稱心如意……總之，曲曲折折的人生大都是很難預料的，甚至事與志違居多。

筆者的一生平凡無奇，也可以說是屬於被環境迫出來之類；生長於商家，父母期望規規矩矩繼承家業，做個商人，當然他倆是殷望最好是能夠進一步，「鴻圖大展」，把它發揚光大。祇是筆者卻違背他倆的期待，自小就喜歡看書。可是筆者不肖，自幼即置家業於不顧，書房、學校課業之外，章回小說染上了癮；稍大，更終日手不釋卷，讀書範圍也隨之擴大。因為父母認為商人不要高深的學問，沒有升學，所以自己便在獨學之中，中學、大學的講義錄固不消說，舉凡今古、中、日文、通俗或學術，大收廣羅，理化、自然科學之外，無所不讀，而且讀得入迷，看不懂的，則非追根究底，摸到「通」不肯罷手。

在年輕時候，激於民族熱情，曾插手反日運動，到了反日運動被日當局扼殺之後，朋友們相繼辦雜誌，當時每有囑咐，便寫些新詩或者評論之類來塞責應付，並藉此填填精神上的空虛。後來復又由於偶然的機會，捨棄了商人生活，遠渡大陸進入報界，這遂成了文筆生活的轉捩點。本省光復之後，仍繼續編與寫的工作，編的方面，則或編報，或主編通訊社、雜誌、誌書，就是從事公務，工作也並無二致；寫的方面更加不必說了。現在雖然退休，賦閑在家，還時常寫些東西應景。

幾十年來，筆者生活就是在這編和寫之間，也可以說編是正業，寫是副業，一家大小能夠安定過日，都是這兩種工作所賜。現在年逾古稀，回憶過去，對在天之靈的父母，雖然未能依照他倆的厚望，做個商人，內心難免有點愧疚，但自己能夠走出一條小路徑來，而且不累人，未至辱及地下的兩老，也聊可以自慰。

筆者在上面也已說過，人生在世，走的路大都是環境迫出來的。筆者也是如此。而且正業都是與「編」字有關的，編輯、編輯主任、主編、編纂、編纂組長等，幾乎佔了全部生涯。至於副業的寫作，差不多也都是被迫寫出來的，這一面向的時間更久，因此，範圍很廣泛。日據時期的詩、小說、論說、文學評論等固不消說，光復以後的社論、鄉土史、史論、誌書、風俗資料、考據、兒童文學、報告、民間故事等等，莫不如此。自古，在臺灣，文字工作不受重視，這當然是這地方的客觀環境使然的，然而筆者不敏，一輩子竟然在這劣惡的環境中打滾討活，與文字結了不了緣，縱然與自己的興趣不無關係，可是或者是「命該如此」。

筆者自幼身體孱弱，且性懶直不善言詞，沒有商才，粗重的靠體力的生活，更是無能為力。所以早年關心筆者的一些戚友就很擔心，據說每提起這「文不能童生，武不會槍兵」的將來，便感頭痛。現在半生已經安然挨過，日後互相碰頭，還要提起此事，感嘆「天不絕人之路」。

文友們每當碰頭，大都要欣羨筆者一生能夠一貫地從事文筆工作；其實，這種看法並不盡然，「一貫」地從事文筆工作固然不錯，但如正業的「編」，有編報，有編兒童讀物，有編雜誌、誌書、有文獻工作，範疇都是不同的。至於副業的寫作更是五花八門。這時候都要慶幸自己的興趣涉及多方面，而更慶幸早年亂讀所得來的知識，得以派上用場了。

這次幸運，承張良澤先生的好意，把歷年來各種拙作編成全集，又承德馨室出版社主人洪宜勇先生慨允出版問世。幾十年來，筆者撰作雖多，所涉方面也廣，這些龐然的雜物是否每篇都值得一讀，或可以留下來供後人的參考，那只好讓賢明的讀者自行判斷了。

謹談些寫作往事以代序，請讀者原諒。

王詩琅 識 一九七八年八月廿日



# 寫於《王詩琅全集》出版前夕

張良澤

陌上桑兄來信說：「奉洪社長之命，全集鐵定於六月底出版。」這一下子把我逼急了。本來約定全集十一卷校畢之後，我要寫一篇總論冠於前，年譜及作品年表附於後，以求全集之完整。不料印刷廠三拖四拖，拖了一年有餘，還沒全部就印之前，我就匆匆來日，身邊所帶資料有限，日日盼望校稿全部到齊，即可動手寫完整論文，可是來日半年，又未見動靜，而今突然要出書，叫我有如鍋中螞蟻乾焦急。

想想，也好，只要早日出書，雖不甚完整，也可了卻一樁心事。其實，我心裏老有個疙瘩，當年我編第一套全集《鍾理和全集》時，鍾理和已去世十多年了；而編第二套全集《吳濁流作品集》時，吳濁流先生也逝世一週年了。我真恐懼這次第三套全集也叫作者無法目睹自己的全集，可就悔恨莫及矣。我這種擔心，絕非對王老先生有何不敬；相反的，只因我太敬愛他了，所以越加希望能讓他看看自己一生心血的結晶，則死亦無憾矣。說不定未老先衰的我先他而死，則我亦心有不甘。所以，能早日出書，雖欠完美，亦未嘗不是好事。

然則，總要寫點什麼前言之類的文章，交代編者的話，才像個編者的樣子。於是乎

寫於《王詩琅全集》出版前夕／張良澤

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於後。再附略年譜、年表於卷末，如是差強可也。

記得早年參加吳濁流的《臺灣文藝》年會時，常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坐於前，走路時，撐著拐杖一跛一拐的樣子，便覺這位老者精神真可嘉，大熱天還趕來參加開會。可是當時我年事尚輕，正勇於衝破傳統，對於老先生們無多大興趣，也就未多加理會。以後，我從反傳統的階段漸漸鑽入傳統尋求自己的根時，發現了無窮無盡的民族文化遺產，我決心要把這塊歷盡滄桑的泥土裏所淹埋的前輩作家一個個挖掘出來，讓他們重曬太陽，發出燦光。當然個人力量有限，而當時又沒有志同道合的人，所以只能就較方便之處著手，慢慢地挖、慢慢地整理。每當我挖到一個，就有一種新的喜悅；為了讓更多人分享我的喜悅，常誇大渲染我歡呼。因此難免叫其他還沒有被我挖到的人說我評價有欠公允。王詩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當我間接地聽到王詩琅先生對我有些微言之後，我就決心鑽入他的世界，看看他到底有哪些東西。

果然，我發現他是光復後第一個有系統劃分臺灣文學史期的文學史家；第一個有系統整理臺灣文獻的文獻學家；且是比楊逵、吳濁流、鍾理和更早，而與賴和同時期的臺灣文學創作家。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是我少年時期最崇拜的童話作家。

有一天，我按址前訪，在萬華區的充滿尿氣的窄巷裏，找到一家臺灣老式的小院宅。古老的圍牆內，擺著幾盆花木；小客廳陳設祖牌神位。老先生在後房應聲，卻久久不出

來。原來家中無人，他須獨自撐杖，拖著不動的下半身，慢慢踱出來。第一次正式面謁，他很豪爽地答應把全部資料借我影印。

他雖行動不便，精神卻異常健饒；兩排假牙雖搖搖欲墜，音量卻很宏亮。他毫無文人的臭味，提到不順眼的事，他就破口大罵「幹你娘哩」；與緻低沉下來時，他就自語道：「我們老伙仔無路用啦。」

他的書桌、書架堆積如山，可是找起東西來，卻頗順手；記憶力甚強，幾十年前的舊稿，他還記得放在哪個抽屜。只要有重複的資料，他就慨然見贈。

當他翻出一袋很多插圖的剪貼時，我真嚇了一跳。原來我在小學時最愛讀的《學友》雜誌的臺灣民間傳說、世界童話名著等作品，十之八九都出自王先生之手。受了這些故事的影響，我於小學六年級時，寫了生平第一篇創作〈矮爺柳爺〉，並第一次大膽地投給《學友》，夢想著自己的作品被刊登時，還有精彩的插圖。當然，此去石沉大海，因為那是仿寫王先生的〈七爺八爺〉。現在回想起來，我一生之所以會走上文學之路，不能不說是受了王先生的誘導。

三十五年後，我才見到冥冥中的啓蒙師，我要補償我的缺失。於是，一年間，我奔走於臺南、臺北間，把他的全部文稿影印並裝訂成冊，送一套給他，我保存一套。適逢德馨室出版社洪社長來索稿，我便推薦《王詩琅全集》，他頗激賞，亦爽快答應出書。

王詩琅生於一九〇八年的臺北艋舺。艋舺是臺北漢人最早開發的地方。臺南府城、

彰化鹿港、臺北艋舺三地並稱，文化發達，人材濟濟。王詩琅自小拜前清秀才王采甫為師，好讀書、尚仁義，十九歲即因反日而被捕下獄，仍不畏懼；二十歲起，以筆代槍打頭陣，以純熟之中文從事創作與評論，啓發民族思想。迄今四十多年，從未停筆，質量之豐，可謂前無古人。

茲將所蒐文稿，分編下列各卷：

第一卷《鴨母王》——集臺灣民間故事為一冊。這些故事已傳誦民間百年以上，溶入臺灣人血液中，膾炙人口。但現代的孩子們已很少再從大人口中傳聞。王詩琅多年蒐集民間故事，除了他個人的愛鄉愛土的感情之外，最大用意，想他是用來潛移默化民族的幼苗，濡濕幼小心靈。

第二卷《孝子尋母記》——集臺灣歷史故事為一冊。此頗類似第一卷，同樣以幼少年為對象，然大人讀之，亦不免興思古之情。民間故事或失諸荒誕離奇，歷史故事則有幾分正史根據。培育國人民族感情，陶鎔完美人格，莫甚於此。

第三卷《艋舺歲時記》——集臺灣風土民俗為一冊。王詩琅半生用力於此，寫來有憑有據。古有稗官採集民歌，以諷王政；王詩琅可謂今之稗官。素樸古風，濃郁人情，端賴於此；逸民逸事，民憤民情，足以為政者鑑。

第四卷《清廷臺灣棄留之議》——刪《臺灣通史》為一冊。臺灣之有史四百年，然臺人不知，豈不可悲？文獻會出版之《臺灣通史》，部份非出自王筆，為求名實相副，刪

去他家之文，難免破離，亦非得已。讀此一卷，則知王詩琅未離中國歷史傳統。

第五卷《余清芳事件全貌》——集臺灣片斷史論第一冊。此卷為王詩琅從事臺灣史研究之學術論文集。足為第四卷之佐證。

第六卷《三年小叛五年大亂》——集臺灣社會生活為一冊。王詩琅不僅關心過去的歷史傳承，且關心當前的社會生活。書生可以不問政，但不能不關心社會。他於臺灣光復之初，一如所有的臺灣知識分子，勇於擔負社會建設責任，主策《和平日報》社論，洞察過去的臺灣社會問題，籌謀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第七卷《臺灣人物誌》——集臺灣人物略志為一冊。臺灣有史以來，活躍政壇人物及言行足以垂範後世者無數。王詩琅博採群籍，摘錄其志，以免湮沒瀚海。後人尊其行跡，以明歷史，以繩志行。

第八卷《臺灣人物表論》——集臺灣人物表傳為一冊。王詩琅於第七卷上千人物中，曾就較特殊人物為之立表立傳。

第九卷《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集臺灣文教論文為一冊。王詩琅是第一代的臺灣文學作家，半世紀來臺灣文壇的動態及臺灣文化的流變，王詩琅莫不瞭如指掌。本卷為研究臺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亦可供當前作家之指引。

第十卷《夜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為一冊。王詩琅以從事文藝創作起來，且於日帝高壓下，以純熟之中國白話文創作，除賴和外，恐無可匹敵者。王詩琅之日文造詣甚

深，然從未以日文創作，憑此，就可知道他的作品絕非無的放矢。

第十一卷《喪服的遺臣》——集兒童文學之創作及翻譯為一冊。吾未見臺灣作家之中，有如王詩琅之重視兒童教育。中年主編《學友》雜誌時，即全力鼓吹兒童的美術教育、健康教育、音樂教育、文學教育；透過《學友》社舉辦兒童各種活動。為兒童寫報導，開臺灣報導文學之先鋒；寫臺灣民間故事、中國歷史故事、培養民族情操；簡譯西洋文學名著，提高兒童文學素養。與其說王詩琅是兒童文學作家，不如說他是教育家為當。

以上，我又犯了喜歡誇張我的歡呼的毛病。但我的確狂喜，當另一個民族瓊寶獻給廣大讀者時。人生難得幾回狂喜。我又何必矯飾斯文？

有這份狂喜，也該感謝洪社長的魄力。臺灣出版社多如牛毛，但一口氣出個人全集十一卷，恐未多見。希望這種愛護作家、珍惜文化遺產的出版社能維持下去，就得靠廣大讀者的支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於日本筑波大學